

推動志願服務以增進社區發展

曾華源

一、社區工作對社會發展之重要性

臺灣在工業化以後，交通之日益發達、通訊之日益進步，使農村與都市間的文化與生活上的差距日漸縮短。社區的聚居範圍日益擴大，人口的流動比率日益增多，居民由同質而異質，社會由單純而複雜，工作地與居住地分開，同事的關係變得比鄰居的關係密切而重要。社區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及居民之間的關係已與過去大不相同。現代社會中科層體制盛行，使得社區中的各種服務機構與工商事業團體均受制於大社區的上層組織，著實剝離社區居民彼此之間的關係和對其所在地的社區公益的關心（陶蕃瀛，一九九九）。此種工業社會中社區縱的關係（vertical relationship）或稱「外在關係」之日益增強，乃使社區中的橫的關係（horizontal relationship）或稱「內在關係」，即社區內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關係相對減弱（徐震，

一九八〇）。亦即地緣性社區意識變為薄弱。

社區工作是一種組織並教育民眾的過程，基於社區居民共同利益、觀點或立場，進行一系列有計畫、有組織的教育和激勵方案，以便引導他們產生集體合作意識，運用資源促成社區互助行動，來解決共同問題，共謀地方發展與社區生活品質提昇的工作過程。換言之，社區工作即是協助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引發社區的自助行動，運用社區的內外資源，共謀改善或解決社區問題策略，養成社區自主與自治之能力，提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蔡漢賢，一九九六）。楊慧琪、郭金水（一九九六）指出臺灣傳統農村鄉民間緊密結合的社會關係，轉變成群眾間的疏離與孤立，甚至對其居住區域內公共事務的參與，亦持冷淡的態度。除非直接關係到個人的權益，同時又有人加以動員組織，否則很難期盼居民的主動參與。因此，臺灣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之侵襲，社區工作會面對著嚴峻的挑戰，如何才能重新喚起社區意識，動員社區的內外資源，來共同參與與關心社區中的公益事務，或社區共同需要與共同問題，以營造一個人親、

士親與文化親的家園，便成為臺灣當前研究和實務工作上頗受關注的議題。本文將簡略整理臺灣社區工作概況後，再進一步討論社區工作所面對的挑戰，最後再提出如何藉由推動志願服務的途徑來增強社區工作效能。

一、臺灣社區工作發展二階段

臺灣社區工作歷史階段各有不同的論點（徐震，一九九九；賴兩陽，二〇〇二）。不過大致尚可分為二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

社區基礎工程建設與社區性活動

民國五十三年由張鴻鈞教授從聯合國引進「社區發展」，並由行政院於民國五十四年列為「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中七大項目之一，決定採取社區發展模式以從事社會建設，並於民國五十七年由內政部依據「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內涵，擬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做為各級政府推行社區發展工作之準則（蕭玉煌，一九九九）。明白揭示有三大目標：完成社區基礎建設，以消除髒亂，美化環境；實施生產福利建設，以消滅貧窮，改善民生；推行精神倫理建設，以端正風氣，重建道德。

同年，由臺灣省社會處公布「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將臺

灣省依照地理特性和居民生活之共同需要，劃分為四、八九三個社區，預計在八年之內全部完成社區的基礎建設，再依次推動生產福利建設、精神倫理建設，以落實政策實行。五十九年內政部在聯合國發展方案協助下，由中美基金及政府的補助配合下，成立了「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展開對臺灣地區社區發展工作研究和觀念的宣導工作，落實研究及人才培訓的工作（賴兩陽，二〇〇二）。

臺灣省政府於六十四年另頒「社區發展十年計畫」來取代「社區發展八年計畫」，比較兩計畫內涵之差異大約有四：一是延長社區建設之年限；二是經過檢討，將原計畫發展的社區減少為三、八九〇個；三是強調基礎工程、生產福利和精神倫理三大建設不能偏廢（賴兩陽，二〇〇二）；四是在全省各縣市鄉鎮村里成立「社區理事會」。民國八十年修訂「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將以往由村、里、鄰長組成之「社區理事會」改為以依「人民團體法」組織型態運作，並鼓勵基層民眾民主自治和自助互助而自行成立的「社區發展協會」。

不過這個階段的社區發展工作，明顯的受到鄉村建設運動與聯合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的影響，其推動地區以鄉村為主，工作重點在基層工程建設。社會福利只是從屬的角色，中央對社區政策的重視仍然不足，社區發展有關的工作還是靠臺灣省政府在負責推動（賴兩陽，二〇〇二）。由於「社區發展協會」和基層行政單位的村里常有政治利益衝突，而且社區工作偏重視硬體建設，

靠政府經費建設，仍然不易激發社區自主性，社區硬體建設成果仍不易維持。

（二）第二階段：社區總體營造vs社區運動

對於社區發展外移式的作法在推行多年之後，各方提出許多批判與反省，期望有新思維和工作模式；加以隨著全球化社會變遷潮流的衝擊，臺灣地區的家庭、社會結構，也相繼呈現因人口結構老化、婚姻價值及家庭型態多元化¹¹等因素所衍生之相關家庭及社會問題。加以政府財政與民間福利需求失衡，以及受到英、美等福利先進國家「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與「福利混合經濟」（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新社會福利意識之影響，開始針對福利服務供給面提出「福利社區化」、「社區照顧」等新構想，試圖將社會福利服務與社區發展工作做充分結合，期藉由運用廣泛、多元的民間資源來共同為社區中有特殊需求的福利人口群，提供更合乎人性、更便捷、更具可近性且能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之社會福利服務。

在八十四年「全國社區發展會議」中的結論，強調應有整體社區發展，健全社區發展協會，並且社區應該配置專職社會工作人員。內政部爰依此項建議開始研究規劃一個有系統、整合性的「社會福利社區化」推動策略。先於八十四年將全國社區發展會議之結論及建議事項彙整後訂頒「加強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方案」，除了推動福利社區化研訂「福利社區化」的具體措施與實施步驟，規劃推動

「福利優先區」創新措施，建立社區服務網絡，以落實結合社會福利與社區發展的新政策。八十五年核定實施「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要點」，使這項工作得以法制化（陳武雄，一九九七）。這是扭轉過去社區發展工作一向以「基礎工程建設」為主體，改為照顧社區弱勢族群。

此外，在全球一片「社區化」、「在地化」的「社區主義」呼聲中，臺灣地區除社政部門倡導「社會福利社區化」外，其他各部署會相關業務單位，亦相繼提出各種以社區為實施基礎的業務推展計畫，諸如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環保署的「社區環境總體改造」、警政署「治安社區化」、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經濟部的「形象商圈」、教育部的「學習型社區」以及營建署的「城鄉新風貌」等。但是「社區總體營造」一詞之內涵並非以整個社區全方位之發展為主，而是希望藉由文化活動或建構社區文化主體性來促使社區居民關心社區，培養社區意識（曾華源、郭奇正，一九九五）。是否真能達到此一目的，而且大量成立的文史工作室是依靠政府經費支持社區活動，是否還是國家機器對社區自主性的壓抑（陶蕃瀛，一九九九；夏鑄九，一九九九），值得省思。再者，這種凡事強調「社區化」、「在地化」的社區主義趨勢，意味著政府企圖和期盼將其照顧責任落實並紮根於基層社區，同時，透過政府經費支援或分配的控制，也隱含著社區民眾或組織將被期待與政府部門相互配合、共同承擔推展這些業務之責任和使命。其結果是否對提升社區發展的自主性有幫助，自然有許多人提出質疑（黃麗玲，一九九五；夏鑄九，一九

九九)。

另一方面臺灣在解嚴之後，民眾對維護生活上利益更能直接表達。社會上有許多自力救濟和抗爭行動。在社區環境保護意識上強烈，對於政府公告的環境規劃感受到威脅時，社區居民常發動保衛社區的抗爭運動(周思萍，一九九六)。而這種社區環保抗爭對於社區意識覺醒和社區居民團結有所影響和示範作用(蕭新煌，一九九九)。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也影響到社區發展協會重視社區居民的成長學習，主動關心如何建構社區經濟或保留社區文化藝術，以及社區弱勢居民的福利與照顧(陳珮淇，一九九九)。因此，有逐漸從過去依賴政府的社區和抗爭社區，轉變為更多自覺型社區和學習型社區(丘昌泰 陳欽春，二〇〇一)。有更多社區主動居民投入社區工作這些轉變，使社區工作已經不再是政府單位的業務，而更加重視社區工作之「過程」(徐震，一九九九)。一九九八年三月民間關心教育改革之人士組成「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並於當年九月在臺北市文山社區成立「社區大學」。目前全臺灣有三十幾所社區大學。此外，臺灣在九二一震災後，草根性強的學者專家和民間社團積極投入協助，而有更多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重建工作(陶蕃瀛，一九九九)，更顯示出臺灣社區工作之內涵與過去大不相同，對於社區自發性能力有所激勵。

今年臺灣村里長的基層選舉參加競選人數比過去更多，競選政見更見到強調維護社區居民權益，顯示社區意識和社區自主性增強，對社區工作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三、當前臺灣社區工作所面臨之挑戰

(一) 社區組織之健全度不足，未能培養社區領袖，重視社區權力結構議題

社區權力結構影響社區居民參與和社區內外資源運用的問題。詹秀員(二〇〇二)研究發現在微視系統層面，社區領袖個人參與社區之動機、認知傾向和工作方法會左右其工作成果，進而影響社區發展功能之展現；但是在巨視系統層面，則是社區權力結構影響社區領袖個人取得領導權力、動用資源、發揮領導功能、推動工作，進而展現整體社區發展功能之重要關鍵因素。所以社區工作的推動不可忽視社區領袖與權力結構之議題；亦即社區工作是誰在推動？是什麼人在擔任社區領袖？而社區領袖的條件為何。值得關注的是社區之中社區發展協會與村里長、水利會和農會等組織之間，彼此權力或利益糾葛和衝突，常影響社區工作之推動。政府部門常未能真正關注社區理事會的改選與組織運作是否有促成社區參與，並且真正發掘人才來推動社區工作。

(二) 社區機構缺乏整合和社區工作推動專業人力

雖然社區工作與社會個案、團體工作並列為專業社會工作領域三大直接服務方法。社區發展在臺灣推展三十多年來，在政府部門中，無論從中央、地方到基層的業務主管單位，乃至民間社區組織，真正受過社區工作教育訓練的專業社會工作者介入似乎甚少。在這種始終缺乏專業人力介入情況下，多年來社區發展在各級政府負責規劃政策、提供行政及經費支援；學界不斷提供理論性敘介及評論性建議；而民間社區組織則在對社區發展概念模糊、方法技術不足之下，各以經驗法則或土法煉鋼方式，有樣學樣的競相以爭取籌建社區活動中心，改善道路、排水溝等硬體基礎工程為主；復以成立各類以提供居民休閒、娛樂或學習為目的之社區媽媽教室、長壽俱樂部等社區班隊為輔；並依民俗節慶舉辦若干應景活動，來帶動居民參與社區共同行動。及至近年，始在環保、警政等單位輔導下，又陸續加強諸如環境保護、守望相助等較具服務利他性質的社區志願服務班隊，推展著當前社會各界所謂之社區發展業務。雖然社區組織與活動比過去增加，但是完全沒有任何具體資料呈現社區工作績效，而且對於社區居民的自主性和社區參與有多少影響，仍未有具體研究。

此外，王麗容（一九九九）提到目前許多社區工作的推動是以機構為基礎，曾華源（二〇〇〇）指出各社區機構之間競逐資源和自主性過高，組織存續和彼此相互依賴之衝突；福利需求優先或市場競爭效率，兼顧自主性與對政府依賴的兩難，致使機構之間要能有好的合作不容易。加以政府與民間缺乏整體考量，政府和民間只

重視硬體工程建設和大型活動，而忽視福利服務之主體，根本不重視專業人力之待遇與投資。由於政府社會福利資源被分割和不重視，導致配合現有資源而非挪出資源。而資源分配制度常出現政治力介入過深而扭曲制度公平性和阻礙制度之實施，這也包括民眾民主社會權利之智能未至成熟。這是缺乏案主權益優先與專業效率與品質責任之意識，也缺乏事前做好規劃之認知，呈現出有做就好的慈善性心態。所以社區資源網絡整合是理想實踐的程度，還是只是應該要努力之目標？

（三）社區居民參與不足

蕭玉煌（一九九五）指出臺灣省社區發展實際推動之成效常偏於物質建設，社區基礎工程為第一貢獻，以道路改善、修建排水溝、修建社區活動中心及美化社區環境四項最有貢獻。回顧三十六年來臺灣推動社區發展之工作模式，似乎受政府力量介入方式之影響而顯得較傾向「由上而下」之工作模式。社區發展的目的，應在於培養居民的自覺自治，而社區民眾自治能力的養成，亦非一蹴可幾，其動力來源，應是發自民間，由社區成員自行發現社區的問題所在，並藉由參與的過程，凝聚共識，以謀解決之策。以往由政府所推動的社區發展工作，常是「由上而下」宣導式的推行政令，因未能深切體認「參與」與「溝通」的重要，以致難以獲得民眾的認同，過度依賴政府資源投入（賴兩陽，二〇〇二；王麗容，一九九九）。施

教裕(二〇〇〇)認為歷年來推行社區工作投入不計其數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其結果社區硬體建設、社區班隊及居民活動是有累積某些具體可見之成果。惟在社區活動型態仍大多停滯在「自利型」、「受惠型」、「消費型」和「自我成長型」之層次，至於近年來為因應社會變遷所衍生的家庭及社會問題，政府及專家學者所倡導的「利他型」、「互助型」和「公益型」的社區行動，雖已獲致多數社區響應，紛紛籌組愛心媽媽、守望相助、環保志工和各種志願服務團隊等社區班隊，但這些班隊對於社區現有問題及區內弱勢居民之服務需求，似乎仍未普獲社區班隊領袖的認同、重視而給予認真的回應或付出，使得社區發展功能至今仍難以突破現況(施教裕，二〇〇〇)。

社區中的人常被動等待參與和參與不足，其原因是該提供參與機會的領袖提供社區參與的資訊不足所致？還是社區居民害怕繁事纏身，或自找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心態，致使依賴大社會安全制度與危機救援制度？為何社區參與阻礙重重，是管道不足或缺乏參與意識，而管道缺乏是有人害怕社區居民參與，還是居民缺乏公民意識與精神所致？人多口雜，批評意見多於建設意見，見義勇為的人實在不多，這是顯示社會民眾缺乏公民意識和參與精神，或是對社會的疏離無力感影響所致？還是因為不參與也影響不到自己的社會生活與權益？還是因為社區的規劃與工作對人與人之間的影響太少，使人不必依賴社區就可以生活於社會？不管這是什麼因素影響，這是我們期待民主社會中應該有的社會生活方式？更重要的

是在全球化影響與持續變遷的年代，世界變得更小和更複雜，人與人更需互依互助，更需要重視社區在生活中的主體性。

(四) 社區自主性受壓抑

徐震(一九八〇)對社區一詞的解釋歸納為三項重點：指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區的一群人或這些人生活所在的地區；指一群具有共同經濟利益或共同文化傳統的人群或國家；指共有、共享、相同、認同或共同參與等情況。陶著瀛(一九九九)社區基本上是日常生活中互助分享的關係網絡。因此，社區的本義接近「共同體」的涵意，指一群具有共識的社會單位，其共識的程度，也就是「社區意識」，它既非單純的空間地域單位，更非行政體系的一環。由此看來，什麼叫作一個「社區」這個問題應該由居民自己來回答。夏鑄九(一九九九)強調社區意識是被建構的，是一種政治過程，它是一個市民社會浮現的條件之一，這是將人們從一種自在的社區(communitas in itself)轉化為一種自為的社區(communitas for itself)。而這也是一種歷史過程，以草根的社區重新構建社區之意義。這才是經由社區賦權重新定義社區的過程。所以就臺灣的個案言，在國家之政治權力結構再結構的歷史時勢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會以不同的政策名稱，提出社區營造與社區賦權的計畫，試圖來正當化國家(黃麗玲，一九九五；夏鑄九，一九九九)。就此觀點來看，一九九〇年代初行政院文建會所發動一個特殊的文化政策——社區總

體營造，以及後來一些其他的中央政府部會也推出類似的政策：像環保署、經濟部商業司、內政部營建署等，還有在地方政府；如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主導的地區環境改造案，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的宜蘭縣、新竹縣、市、高雄縣、連江縣(福建省的馬祖列島)；等的積極作為，在在顯示此一意涵。Gamble & Well (1996) 社區工作必須持永續觀點，除了關注是否損及下一代需求滿足外，更應該關注多元整體之發展和社區凝聚力之建構。如此說來，回顧臺灣社區工作，不僅支離破碎，沒有整體社區自主性發展策略，也未能培養互助關懷的社區意識。所以在過去幾十年之中，社區工作並不是對社區賦權（丘昌泰 陳欽春，二〇〇一；夏鑄九，一九九九）。

四、推展志願服務以強化社區工作

就民主體制而言，社會功能的發揮，主要仰賴人民能參與，並且避免特權的存在。志願組織成員之關係並非立基於以酬賞為結構之專業性服務，而是基於互惠性的關係提供協助，其是基於人類社會生活共同需求之直接行動反應。其中社會性參與不僅可以表達權力，強化社區功能，以滿足社區民眾社會生活需要外，另外，志願服務基於人性上的相互關懷與互助，可以降低社會疏離感。因此，志願服務在滿足人們需求上，就具有自主性、可接受性和較高的立即性。

（一）推動居民參與社區活動來建構社區自主性

Midgley (1992) 認為，從民粹主義的觀點而言，社區參與理念指出一般民眾受到政客及官僚體制的剝削，從而被排除於政治事務甚至是一般的發展過程(Development Process)之外。因而受民粹主義意涵影響下的社區參與，代表了一種從基層人民群眾發起的，不願受官僚、政客私利的影響而開展的自主性運動。夏鑄九（一九九九）全球經濟已經經由跨國的勞工移民增加了全球城市一區域的族群與文化豐富性。社會結構日增的豐富性與其社會動力，要求這些城市、區域能提出新的多元(重)文化之地方政策。所以，像新政治中的階級、婦女、男女同性戀、以及少數民族；等所涉的社區運動與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社區參與有歷史性的關鍵作用。夏鑄九（一九九九）指出我們都還在摸索和尋找抵抗已經來臨的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矛盾。建構社區自主性是要抵抗並翻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而不是回復過去傳統社會生活。社區參與提供的也是一種過程，它與草根人民結伴而行，一同改變空間，以及改變社會。

「社區參與」定義為：由社區居民共同參加以該社區及其居民為範圍與對象所發起促進該社區發展的一切行動。參與可分為「自動參與」和「動員參與」二種。「自動參與」係指行為者本身企圖影響決策的活動；「動員參與」則指被動參與他人策劃影響決策之活動。自動的社區參與雖是社區參與理念的目標，然而藉自動而產生

的社區參與，亦可刺激大多數沉默居民的社區意識，因而朝自動的社區參與來發展。就此而言，動員的參與亦是社區參與的一種有效途徑。積極推動各種社區活動（文化、教育、舞會、家庭聚會），成立各種文化活動隊伍、休閒社團等等，以凝聚社區情感與認同，藉由動員參與，達成自主參與。

但是過度依賴政府資源，並且彼此工作缺乏整合，使社區資源未能被妥善運用。要能整合各面向社區工作，有人提及建構社區資源中心（王麗容，一九九九；賴兩陽，二〇〇二）。但是，要找出社區特色和資源，並願意積極投入，就必須重視建立與強化居民生計與互助分享關係的網絡（陳佩淇，一九九九），以促進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規劃過程，提昇社區自主與活動能力為目標。否則社區資源中心恐怕還是不脫以機構為推動社區工作基礎，而只有少數人參加的社區工作。

（二）藉由志願服務增進社區融合與 凝聚力

由於社會參與要求政策決策過程的透明性，使社會中社會階級與權力較弱勢之不同團體能有力量影響決策政治過程。亦即社區參與提供了一種機會，創造了新的方式來鬆動既存的社會關係，社區參與的機制可經由民主的過程逐步釋放機會的力量，以轉化國家屬性和國家負擔。這也就是經由社區賦權的過程來真正營造社區，避

免民粹主義的政治明星假借民主而實行獨裁。九二一震災經驗可知，在日常生活中的問題與危機是社區動員的必要元素。因此，推動社區工作之基礎應該要創建參與與責任的價值。在制度上應該要求社區公共事務有參與管道，不僅僅是有權知道社區參與之資訊，更重要要有反應社區生活需求之管道，肯定社區參與的價值。

要積極推動社區志願服務，以志願服務本質為本，來培養社區意識和參與精神。公民社會組織是建立在地方志願團體的基礎上，志願團體聯合起來解決當地的問題和人們關注的事情（丘昌泰 陳欽春，二〇〇一；江雪齡，一九九一）。志願服務藉著以下列方法實現：

持續加強社區的人性價值如愛心與服務。協助人們獲得新知與技能，發展個人潛能及創造力。社區成員透過參與志願服務學習成長後，更能行使其權利與責任，完全地發揮人的潛力。透過彼此相互溝通瞭解，以弭平差異，使社區成員能共同生活，為所面臨的挑戰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引導社區居民參與志願服務可以為無法表達意見的群眾提供發言管道，讓社區成員共同解決問題。提升家庭、社區、國家與全球的凝聚力。

（三）藉由宗教力量推動志願服務，以 增進社區互助體系功能

資本主義盛行將有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繁榮，但是，實質上所付出的代價是社區內家庭宗族關係網等共生互助系統功能減弱（陶

著瀛，一九九九）。因此，如何推動社區志願服務來促成社區中互助體系，就不能忽視社區中的宗教組織在社區生活中的力量（王順民，二〇〇一；陶著瀛，一九九九）。其中慈濟功德會以慈善志業推動成立各種志願組織最為顯著。證嚴法師在八十五年提出社區志工，將宗教關懷和社區志願服務結合，各地志工定期聯絡情誼，瞭解社區需要，以便就近關心社區需要。這種慈濟精神平時關心社區弱勢，實踐社區環保工作，而在緊急事故時可以立即有組織性反應；如九二一震災的救援，這種「宗教精神服務社區化」，能真正動員社區力量，在臺灣各地帶動整個社區工作的實踐性，使社區需要和社區工作緊密集合，顯示臺灣宗教世俗走向，對社區發展具有高度潛力。

（四）藉由推動服務學習 以達成社區關懷與社區參與之潛力

服務學習是一種教與學的方法，連結有意義的社區服務經驗和學術的學習、個人的成長，以及公民責任的養成（Duckenfield 與 Wright, 1995；引自趙希斌 鄒泓，二〇〇一）。美國一九九三年的服務行動（Service Action）服務學習指的是一種方法，透過學校和社會的合作，將提供給社會的服務與課程聯繫起來，讓學生在參與有組織的服務行動中得到社會需求滿足，並培養社會責任感，同時學習並獲得知識和技能，提高與同伴和其他社會成員合作、分析、評價及解決問題之能力。所以服務學習是「服務」與「學習」的結合。

簡言之，就是「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服務學習具有下面幾種特質。藉由社區安排所需要的服務來幫助學生或參與者學習與發展。社區與各中小學、高等教育機構及社區服務計畫中心相互協調合作。幫助培養公民責任。整合並用於加強學生的課業學習，或參加者所參加的社區服務計畫中有關教育的活動。提供學生或參與者特別安排的時間，以回顧他們的服務經驗。教育工作者及社區領袖愈來愈視孩子參與服務學習是改善學習成就、支持校方改革及更新社區的強有力策略。在服務學習中，學生將服務經驗與學習相結合，同時也對學校及社區做有意義的貢獻。

服務學習是將課程、服務和反思（Reflection）結合起來的過程，與強調提供服務的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和志願者行動（Volunteer Action）是有些不同（Schine, 1996）。服務學習的著眼點不僅試圖通過為社會提供服務來促進學生知識的學習，還希望能夠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社會責任感、奉獻及合作精神。目前臺北市訂定「臺北市公私立高中國中學生體驗學習方案」，青輔會舉辦各中學服務學習師資人才與各種培訓，以積極推動服務學習課程。如能真正落實此項工作，社區居民不僅能關懷與發覺社區需要，並能真正參與社區問題處理，未來對於社區工作之紮根，將有實質之助益。

（五）藉由參與志願服務 培養公民意識

以健全社區組織，培養社區領袖

建構社區能力可經由提升社區居民協同合作解決社區問題的能力，以及增加社區組織的種類、數量、居民在社區內可取得的服務與可參與的活動。陶蕃瀛（一九九九）指出一個好的社區，社區內各種社區組織提供服務滿足基層社區居民需求，並且社區居民有能力運作和維持這些組織。因此，志願服務參與的行動，可以發揮宗教廟宇組織的公益組織功能，增加基層社區公共圖書館開放時間與活動，並強化各基層社區的學習活動方案與服務，以提升社區居民的知能，來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變化，減少依賴由中央政府運作。

在地方政治生態中，不可忽視利益聯盟競逐社區資源的問題。因此，社區組織健全運作是相當重要的課題。除了依規章健全運作之外，各社團組織的社區領袖的發掘與培育相當重要（施教裕，一九九七）。這一方面的課題更顯示運用志願服務來擴展社區公民意識之重要性。

五、結語

在二十一世紀中，到底現在社會生活需要建構何種型態來使社區生活更加有所保障？能讓我們安和樂利的生活在社區中？以臺灣社會經濟狀況而言，除了努力追求社會福利制度與資源分配的公

平性與正當性外，同時對於如何增進社會和諧，民眾互助互利，以創造有凝聚力的社會，亦不可忽視在志願工作推展上。其實政府應該鼓勵居民多參與社區志願服務，以培養更多潛在社區領袖，並減低社區現有不當資源分配的情形，以及增加社區自發性表達生活需要的議題，讓社區居民有更多參與規劃的過程，才能真正回應社區的需求和讓社區有更多自我照顧的力量。

（本文作者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參考書目：

- 王順民（二〇〇一）宗教關懷與社區服務的比較性論述：傳統鄉村型與現代都市型的對照。社區發展季刊，九三，四二—五八。
- 王麗容（一九九九）社區永續發展與國家政策。社會文化學報，八，一四—二一五三。
- 丘昌泰、陳欽春（二〇〇一）臺灣實踐社區主義的陷阱與願景——從「抗爭型」到「自覺型」社區。行政暨政策學報，三，一一—四三。
- 江雪齡（一九九一）義工——推動社區工作的手。社教雙月刊，四三，六〇—六二。
- 周思萍（一九九六）臺灣社區發展政策演變之研究：論國家對社區發展的介入。臺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振春（一九九九）社區經營的四種進程。社教雙月刊，九〇，四〇—四二。

施教裕（一九九七）「社區參與的理論與實務」。社會福利，一二九，二一八。

夏鑄九（一九九九）市民參與和地方自主性：臺灣的社區營造。城市與設計，九／一〇，一七五—一八五。

徐震（一九八〇）社區與社區發展。臺北：正中書局。

徐震（一九九七）社區營造：臺灣社區工作的新程式。社會建設，九七，一一—一五。

徐震（一九九九）臺灣社區工作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表於東吳大學社工系主辦「臺灣社區工作教學研討會」。

徐震（一九九九）臺灣社區工作的新形勢與新願景。社區發展季刊，八八，一六八—一七六。

陳武雄（一九九七）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之政策規劃與具體作法。社區發展季刊（七七），七一—一二。

陳珮淇（一九九九）營造學習型社區工作的回顧與展望。社教雙月刊，九一，三八—四一。

陶蕃瀛（一九九九）打造一個永續的農村社區—一九二一地震後中寮鄉的社區工作經驗。中大社會文化學報，一〇，一一—一五。

曾華源（二〇〇〇）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劃實務工作手冊—社區資源網絡建構篇。臺北：內政部。

曾華源、郭奇正（一九九五）嘉義市成仁街（美街）社區總體營造規劃研究。行政院文建會

黃麗玲（一九九六）新國家建構與社區角色之轉變：生命共同體論

述之分析。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慧琪、郭金水（一九九六）社區參與的溝通行動論初探—以澎湖二崁為例。臺北師院學報，九，三六九—四〇三。

詹秀員（二〇〇二）臺灣的社區權力結構與社區發展功能一質的研究與分析。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蔡漢賢（一九九六）社區意識與生命共同體。人力發展，三五，一八—二〇。

蕭玉煌（一九九五）社區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如何有效檢討社區發展的實務困境暨法規研修。收錄於內政部編印「全國社區發展會議特刊」，頁二三七—二四八。臺北：內政部。

蕭玉煌（一九九九）組織再造—社區組織工作省思與前瞻。社區發展季刊，八七，一六—三四。

蕭新煌（一九九九）社區文化千禧。「二〇〇〇年社區文化研討會專題演講」。臺北：實踐大學主辦。

賴兩陽（二〇〇二）社區工作與社會福利社區化。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韓玉元（二〇〇一）社區性矯正處遇可行性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學報，三八，二四三—二六六。

Gamble, D. N. & Well, M. O. (199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32(3), 210-222.

Midgley, J. (1992).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NY: Methuen, Inc.